



杨东莼(1900—1979)是

中国近现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青年时代参加五四运动，协助李大钊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传播马列主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大学院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馆馆长。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宣传和研究以及中国学术文化史的研究，有专著、译著、论文等多种，共三百余万字。

杨东莼大传

◎周洪宇 等著



◇2013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杨东莼大传

◎周洪宇 等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东莼大传:周洪宇等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622-6638-9

I. ①杨… II. ①周… III. ①杨东莼(1900~1979)—传记
IV. ①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7798 号

杨东莼大传

周洪宇等著

责任编辑:古 沁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罗明波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e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456 千字

印张:28.75

开本:787mm×1092mm 1/16

版次: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7.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导 言：大时代的参与者	1
第一章 逐梦少年	6
第二章 “五四”新青年	26
第三章 从理性之光到革命之路	53
第四章 流亡日本	69
第五章 学术的黄金期	95
第六章 “杨把戏”	111
第七章 抗战救亡	143
第八章 再为“冯妇”	175
第九章 逃亡香港	222
第十章 雾都岁月	230
第十一章 短暂的“芳园”	247
第十二章 “一个非广西籍的广西人”	262
第十三章 桂子情深	284
第十四章 真诚与同情的纠葛	300
第十五章 徘徊于学术与政治的苦闷	334
第十六章 落日余晖	357
结 语：历史的评判	368
杨东莼生平年表	375
杨东莼主要编译著系年	438
主要参考文献	446
后 记	453

导言：大时代的参与者

那些渐已远逝的传奇故事，那段无法平静的人生履痕，或是明日黄花，或被尘埃湮没，或在风中消散。岁月其徂，古人乃喟叹：“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杨东莼，这位中国近现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那些作为主角活跃在中国历史中心舞台并给后世留下巨大身影的历史人物不同，有关这位大时代的参与者的传说正逐渐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与记忆，可一旦拨开历史的氤氲迷雾，那些零零散散的记忆碎片不断浮现，总能激起历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好奇与探寻。

握准回忆性的故事脉搏，人们往往习惯从临近生命之河的终点溯流而上。1979年，举国上下沉浸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喜悦里，亿万人民在欢呼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中国社科院组织的“五四”六十周年座谈会上，庄严美丽的穹隆顶下，一群老者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畅所欲言，直抒胸臆。当年的“五四青年”杨东莼说“社会科学院写一本历史书，给青年人看看，但不要写八股文。现在有人还写八股文，写来写去还是那么几句，历史书要有事实，有形象，感染、教育青年人”^①。

当时光倒流至60年前的同一天，即1919年5月4日，关于那场被赋予了神圣的启蒙色彩的五四运动是不是“还是那么几句”呢？京城十三所高校，三千余学生，愤慨于巴黎和会中中国外交的受挫，焦灼于日本将接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记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33。

手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于是集聚天安门，游行使馆区，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诚如杨东莼所言，通常人们耳熟能详的仍是这些被概念化、符号化的“集体行为”，至于那些生动细节却无从得知了。

置身危难交织的时代，杨东莼身处不舍昼夜的时代大潮里，呈现的是怎样的一幅人生图景呢？这是怎样的一位进步的“五四”青年呢？他的一生因“五四”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值得很多人怀念至今？

一个好的历史考据家一定是一位出色的侦探，要想全面客观地描述杨东莼的一生，使读者“读起来像侦探故事”，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什么比跟“五四”一样的重要历史事件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了。

1940年12月4日，中共南方局以周恩来、叶剑英两人名义发电文给李克农，要求他转告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任教育长的杨东莼（地下党员）加强对李任潮（李济深）等人的统战工作，“对李任潮应根据佳电多向其解释华北无法容下两部，我军必须在华中求食，可经杨东莼等促他多做解释工作，并说明反共阴谋之咄咄逼人，企图造成内战以便投降，同时应解释此次白之作反共先锋实为不智”^①。

事实上，周恩来在不同时期对杨东莼有三个评价：一是“杨东莼在广西，力足敌十万健儿”^②。二是“学识渊博，胆小如鼠”。三是“既是老革命，也是新党员”。第一个评价，无疑肯定了杨东莼在广西的革命工作。他曾在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后，受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的委托，从上海专程去南宁，代表救国会入桂“共商国是”，表明救国会“全国应该团结抗日，不赞同内战”的主张，他的雄厚辩才与敏锐眼光使李宗仁、白崇禧另眼相看。

几个月后，“西安事变”发生了，李宗仁、白崇禧再次与杨东莼探讨对时局的看法，杨东莼反对胡鄂公与章伯钧等的做法（他们极力要李济深乘机推动李宗仁、白崇禧起事），尖锐地指出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定的，“西安事变”的结果最终还是由统一战线来决定，并赶到梧州戎墟看

^① 《关于加强对李任潮等人的统战工作——南方局电李克农并报党中央》（节选），冷德慧、毛国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390。

^② 这句话出自杨慎之：《杨东莼年谱》（未刊本）卡片资料。据杨慎之记载，此为革命前辈苏怡口述。

望李济深，要李济深不要上了胡鄂公等的当。结果，“西安事变”的结局和杨东莼所预计的一样。

杨东莼巧妙地利用了当时桂系军阀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白色统治下，先后利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和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身份，在广西建立了小小的革命据点，培养了一批进步的青年，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共产党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杨东莼听从周恩来总理的安排，又一次来到广西，担任广西大学校长，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入桂，他的革命与教育生涯与广西结下不解之缘。时到今日，他仍被亲切地称为“一个非广西籍的广西人”。他曾对学生说：“要一分为二，肯定优点，指出缺点。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要有什么顾虑。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袋袋，我也有一个袋袋，周总理给我的鉴定是‘才高、智大、胆小’六个字。我经常以这六个字来鞭策自己，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①

杨东莼的“才高、智大”不只在前面两大政治事变中得以正面体现。1943年12月，“大别山惨案”（即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刘敦安等中共党员被广西军阀李品仙残酷地活埋）发生后，李宗仁到立煌县（现名金寨县）检阅第五战区部队，皱紧眉头对其部下说：“为什么杨东莼训练的干部如此成功，你们训练的干部这样蹩脚呢？”^②他又唉声叹气说：“我们广西要是多有几个杨东莼那样有头脑的人才就好了。”

同一时期的《政海人物秘闻》第38期，刊登了一篇标题赫然醒目的文章——《王公度之死与杨东莼之乱》，文中称杨东莼入广西为“引蛇入屋”，“杨东莼是文化贩子，略等于陈彬和，不过学得一套革命八股，与共产党有不可解的关系，揖了一个教育家的招牌，在‘九一八’之后，即潜入广西，为中共工作，他身是教育家，却是中共分子。……那么，杨当然做了李白所重视的师范专门学校校长，希望为他们训练广西教育的干部。可是，杨的一套，又是中共的学生的言论行动，在桂林愈来愈凶，李白党皆在南宁，

^① 杨永安：《和杨东莼老校长相处的日子》，广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纪念杨东莼先生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69。

^② 中共玉林地委党史办公室：《桂东南英烈传》（第一辑），玉林地区大众印刷厂，1985：203。

向信任之，忽然发现师专发生了如此重大事件，大吃一惊，将杨东莼免职，派万民一、刘仕湘调查。调查之后，知不可了，乃下令将之驱散。此间学生，多是‘左’倾”^①。

《政海人物秘闻》虽然是反映当时广西党团派系轶事的野史，但反过来证明杨东莼在广西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工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失败后，遭到反动刊物的诟骂。

可见，不同言论者的正反两方面，都可以证实杨东莼的“才高、智大”。那么，第二个评价“学识渊博，胆小如鼠”和第三个评价“既是老革命，也是新党员”，又从何说起呢？要如何充分理解周恩来对杨东莼的这些评价？杨东莼为何认可周恩来对他的六个字人生鉴定是公允的？在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岁月，他真的表现得“胆小”吗？对这一连串问题的解答，显然就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五四”对包括杨东莼在内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像一束黑暗里的耀眼亮光，这只是照亮心灵的开始，至于每个人千差万别的人生轨迹，就像汪洋大海里的一叶扁舟，随着历史大潮起伏伏。如同苏格兰历史学家卡莱尔所说，一个人在读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时，开始总是感到烦躁，甚至会达到痛苦的程度。伟大者命里注定会被误解。这种“被误解”的历史尴尬，杨东莼也曾遭遇。在被理解与被伟大之间，任何一个富有历史正义感、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知识分子都希望选择前者，然而历史往往给了他们后者。

杨东莼怀有一颗知识分子的素心，他信仰坚定如山，学识深广如海，政治智慧如云，但不愿意留下任何声名，常以“甘草”自喻。晚年德高望重的他，被人亲切地称呼为“东老”。著名学者李侃^②说：“此老不但学贯中西，而且政治阅历丰富，对近现代政坛风云、文化历史遗迹、各种人物，如数家珍。平时还是一派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开会、谈话，其言娓娓，思路清晰，说理透彻。对人诚恳热情，对事认真耐心。他与许多高层民主

① 《王公度之死与杨东莼之乱》，《政海人物秘闻》。

② 原中华书局总编辑，杰出出版家，著名历史学家。曾因参与组织出版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和《辛亥革命回忆录》，与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的杨东莼共事。

.....
人士往还密切。”^①

风行水上，原来只是路过，那些传奇的故事，从诞生的一刻起，并不是为了得到永恒的传颂。一生为革命四处“打杂”，勤于著述的他，却没有留下任何自述或日记资料，唯一留下的是为了再次回到党的怀抱，在广西因组织审查需要而写的一份简单自传。

在“不是生，就是死”的大时代里，一颗如此平淡的心，却留给了世人一段跌宕不凡的知识人故事。“五四”散发的时代光芒，远不止照射在杨东莼一人身上。

^① 李侃：《可敬可亲的长者——记文史资料工作的开拓者申伯纯、杨东莼、阎宝航、米暂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5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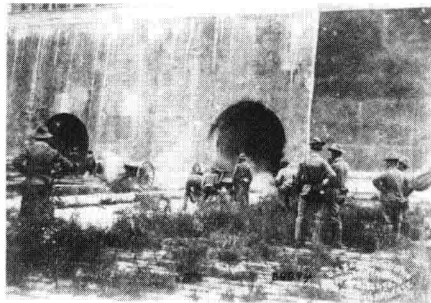
第一章 逐梦少年

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

——《同盟会宣言》

一、庚子国难：爱国主义与激进情绪的双重烙印

1900年（庚子年），以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军队组成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前期由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率领，开始时总人数约3万人，后来有所增加。当时《清议报》所刊登新闻《联军劫掠纪闻》，记述了北京城到处弥漫着硝烟炮火和恐惧情绪的情景：“探得北京已破。华军皆退。列国之军。肆行掠夺。上下军人。皆言我辈为掠夺而来。不然，何远冒危险也。白昼公然无惮，纠合大小军队，横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

行市中。……其掠夺之行为，有令人惊倒者。偶夺一家，恨无所得，则杀戮其全家。居民惊闻，举家投水，举家自杀，不胜其数。北京城各地，乃各国分据。”

这场“庚子国难”最后以清廷战败，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往陕西西安，谈和后中国赔款白银 4.5 亿两为终。列强步步紧逼，慈禧太后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来求得一时苟安。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赫然出现在国人眼前，此时清朝“天朝上国”的盛世繁华已经不再，内忧外患不断升级，中国犹如一艘随时可能倾覆的古船在风雨中飘摇。

正是这一年，1900 年农历 3 月 8 日寅时，杨东莼在醴陵渌江乡河西村（今称“西山史家老屋村”）一个林木丛竹掩映下清幽静谧的小院子中呱呱坠地了。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在罗霄山脉北部西面，西有株洲、长沙，东与江西萍乡相接，居长沙、株洲、湘潭三角地区。县城依山傍水，一道名为渌江的大河，穿城而过，流入湘江，出洞庭湖。这是一个山水秀丽、人杰地灵之地。

离杨家不足 5 公里的北乡，有个株林树下村，村口有一株相传从明朝留下来的参天古树，村中有栋朱家老屋，屋背后靠着一座名为建安山的高岭。这户人家靠守着祖上传下来的一份薄产过日子，世代务农，并不富裕。家中最小的儿子朱竹怡（后改名为朱克靖、朱笃一）这年正好 5 岁，顽皮机灵，经常在一排二层农舍前的池塘边嬉戏，被父母亲叫做“黑子”。这个出身老实农民家庭的脸色黝黑的男孩，在多年后，成为杨东莼关系密切的同窗学友。

杨东莼的父亲叫杨策，祖父叫杨畹兰，曾祖父叫杨东阳。杨畹兰育有三子，即杨炳书（杨策）、杨笔书、杨竹书^①。在渌江乡，河西村的杨姓人家很多，杨东莼的祖上是大户人家，原籍江西省高安县。曾祖父杨东阳靠经商起家，因头脑灵活善于经营，颇有积蓄，家底甚厚。祖父清朝廪生出身，受洋务运动影响，热心于开煤矿、熬樟脑，并设书局发售江南制造局出版的新书，但对于经商心有余而力不足，惨淡经营几年后，几乎败光偌大的家业。到杨东莼出世时，杨家已经衰落，不再是富贾之家了。

^① 参见杨慎之：《程潜年谱 1894 年》资料卡片。

家业不再昌盛，但道统依然延续。杨东莼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晚清社会典型的读书人，深受儒家传统影响。他们有传统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地理闭塞的渌江乡那些终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农民不同，他们关心时政，对外界有一定见识。杨畹兰接受了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希望从器物层面来改良社会、救亡图存，为此他甚至倾家荡产；杨策感受到“甲午战争”惨败的沉痛教训，深信国难之际最紧要的是强兵御侮，于是弃笔投戎，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并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杨策是个秀才，思想比他的父亲杨畹兰更激进。少年时由乡赴省，进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当时省城有岳麓、城南、求忠三大书院。城南书院院长刘凤，学问平常，但喜欢提拔后进。杨策秉性聪明，志气宏远，爱读孙吴兵法和诸葛亮心书。当时与杨策同榜入泮的有程潜^①，二人年龄一样，志趣相合，且是同科秀才，因此交往甚密。

杨家父辈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在不自觉中成为杨东莼脑海里的印记，他继承了这一由修身而经世的传统，这也成为他日后一切行为的前进动力之一。

杨东莼的出生，让杨策喜忧参半，喜则头胎得子，振兴家业有望；忧则国事式微，处境危艰。他给长子取名“人杞”，又取了个乳名“岂匏”^②。有较深传统文化涵养的杨策，给儿子取名字自然有一定寓意。“岂匏”这两个字出自儒家经典《论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③，意指怀才而莫展，如匏瓜中看而不可吃用。也许，是出于对清政治腐败无能的失望，和对国家前途的无比忧虑，杨策希望儿子在乱世里，能成就才学，施展抱负，经世治国，而不是一个无用的“匏瓜”。这是一个封建社会“士大夫型”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景，如同南宋词人辛弃疾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恢复国土无望，壮志难酬，发出了“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的悲怆感慨。

① 程潜，湖南醴陵人，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省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杨东莼在做统战工作时，与程潜交往密切。

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人杞改名杨东尊（莼），并以后者名世。

③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仿佛就是匏瓜，不是挂在那里给你们看的（我要给人吃的）。

杨策与妻子陈氏共有二子，即杨东莼与杨人梗。弟弟杨人梗^①，比杨东莼小三岁。

二、“我的读书过程”

在那动荡不安的特殊年代，杨策同其他受过维新思想激励的改革志士一样，不愿一辈子在家乡苟安下去。在人杞幼年时，杨策就离家求学，先入江南将弁学堂学习，又留学日本专习陆军，并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留下发妻陈氏料理家事。偏偏陈氏体弱多病，在人杞5岁时便撒手人寰，处在懵懂年龄的人杞，对母亲的记忆是模糊的，因此关于人杞母亲的介绍就此寥寥数语。

人杞与弟弟人梗被托付给干妈童氏照顾。这位受到父亲信任的童氏，虽没有发现关于她的更多资料，但从杨家两兄弟后来出色的读书表现来看，至少可以断定童氏对两兄弟，应该是尽心尽力地养育。尽管如此，父亲不在身旁，还是让幼年人杞更早懂得察言观色与为人处世之道。在孤苦无依的情形下，兄弟二人一直相互帮扶，手足情深。也许，在河西村寄人篱下的童年经历，逐渐积淀成为人杞机智灵活、温和敦厚的性格特征。



杨人杞



杨人梗

这两张相片里的杨氏兄弟已年过半百，但仍显斯文儒雅与书卷气质。

^① 弟弟杨人梗 1922 年毕业于长沙长郡中学，在长郡中学读书时，杨人梗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一年暑假，杨东莼的北京大学同学又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的邓中夏回到长沙，他还曾与邓中夏激烈辩论过（周清澍：《回忆杨人梗师》，《东方早报》2010 年 10 月 31 日）。1926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先参加北伐革命，旋返长沙任教于长郡中学。1934 年入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留学，攻读法国史，获学士学位，1946 年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直至 1973 年 9 月 15 日病逝。杨人梗对新中国世界史研究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便提出成立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织世界史学会、创办世界史杂志、编译世界史资料等关系到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为填补中国在世界史研究中的空白，他自 1959 年起放弃了法国史的研究，转向非洲史的研究和教学，培养非洲史专业的研究生，为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们都有知识分子的一双执着的眼睛，充满了对事物浓厚的好奇。确实，他们的学术造诣不相轩轻，对史学研究有共同的兴趣与热望。信仰共产主义的杨人杞，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通史和文化史，他的三本代表性学术著作《本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高中本国史》使他成了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齐名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而早期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杨人杞则翻译了《法国大革命史》（克鲁泡特金著）、《法国革命史》（马迪厄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保尔·芒图著）三本经典译作，编写的《高中外国史》是20世纪30年代最受青睐的历史教科书，他对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兄弟二人思想信仰不同，却取得了同样的高水准学术成就，这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也不多见。

三、“一品当朝”的私塾幻象

作为杨家长子，同当时其他男孩一样，人杞6岁时被送入私塾，接受了两年的蒙馆教育。醴陵上空云气沉沉，社会革命的新思想在不断酝酿集聚。尽管1905年科举制已经停废，1300年尊崇科举的时代终结了，然而“春风不度玉门关”，变革的力量还没有席卷到最底层的教育模式。

清末新政后，已初步建立的报刊媒介，将各种新思维传递至各个偏隅，包括醴陵县城。在人杞入私塾的这一年12月，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派党人到长沙和湘赣交界处麻石密谋策划，发动旨在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萍浏醴武装起义。醴陵各路起义军参加了战斗，起义军人数达3万，声势浩大。这次起义最终虽以失败告终，但给醴陵民众留下了“刚毅好胜、敢为天下先”的集体记忆。

人杞在私塾读到的第一本书，和以往清季初进蒙童馆的学生一样，都是《三字经》。在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宣传者、实践者后，他曾追忆，《三字经》第一页正文的书眉上，绘着一位大官，手拿着上书“一品当朝”四个大字的条幅（伶工称此条幅为“金榜”），大官两旁题着一首绝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四句颇具封建思想的圣人教条，自然被他说成是“歪诗”。他戏谑道，这是一幅非常吸引人的宣传画，因为当儿童头一天读书，脑海中就深深地被烙上一个印象，把读书的目的表现得一清二楚，再明显不过：天子之所以看重读

书人，为的是要把读书人变成替他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在读书人一方面，则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才不得不过着“十年窗下无人问”的勤攻苦读的生活。他把这四句话对儿童的“毒害”，用阶级分析法阐述得鞭辟入里，像受压迫的奴隶抢过鞭子反过来狠狠抽打奴隶主：

这几句诗，便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天子与士的阶级的关系；天子之所以重英豪，便是要英豪替天子保镖；士之所以成为社会上的特殊阶级，便是为得士是封建制度的护卫军；士之所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是为得以图上报皇恩。士的阶级，有了这些特异的地方，所以士便为四民之首。士既为四民之首，在国家在皇室，他便是忠顺的奴仆；在乡曲他便是武断一切发号施令的主宰。无形中他就变成了治者阶级。他既拥有社会的特殊地位，便力求巩固这一地位，使之承袭到他的子孙，所以《管子》上面的士之子恒为士，便是世代书香，门第门阀的口号。虽然以前有些出自贫贱窗前苦读后来荣达的相国巨卿，但是都系例外之例，所以留下的美谈佳话，后世都作为训诫子孙的典型。其他不受利禄的束缚能够冲破网罗的特出的人物，也就只落得牢骚满腹另寻门径发泄罢了。所以在这一时代，读书的人，一般都有企图做统治者阶级的大志，其结果便是要维持封建制度。从而这一时代的教育，便全在养成维持封建制度的精神的劳动力，而其具体的体现便是士的阶级，其系统便是书院与国学，其方法一般的便是科举与擢拔。^①

这里的“士”就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古人说“学而优则仕”，何以为“士”？只有人仕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士”。一句话，做官便是读书的目的和用处。当然，以上这些突破封建藩篱，对旧式教育发起炮火的“离经叛道”的观点，是在他接受了“五四”的反传统的洗礼后所形成的。对这种单一诵读的教育方法，他并不认同。他认为，“从一般的学习来讲，则由于其任务，在于对事物或事象求得总体的有系统的认识和理解，而不在于熟记一些孤立的庞杂的事物或事象，从而也就不着重‘熟读多记’”^②。这就是古人说的：“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光会背书，是不能学成知识的。

① 杨东莼：《中国过去教育的批判》，《北新》，1929，3（9）。

② 杨东莼：《学习漫话》，《青年界》，1946，1（3）。



清季私塾

无论如何，在“一品当朝”的幻象里，两年里他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包举杂字》、《幼学》、《论语》。“老师只教我们读，读了要背诵，并不讲解意义。所以认为读书是苦事，每每逃学赖学。”^①可以想见，每日在先生的逼迫下，摇头晃脑、反复诵读地读死书，未给幼年的人杞留下丝毫的美好印象。在多年后，他在上海参加了陶行知主持的生活教育社，同样以一个教育家和过来人的身份，在对青年的读书问题进行诚挚而热心解答时，尽管内容分析琐碎，但行文却头头是道，最终归结一点：“最紧要的是我们不可‘读死书，死读书’，而应该是‘读活书，活读书’。”^②这种率性直接的论断，不能不说和他幼时读私塾的经历有关。

比他小三岁的弟弟杨人樾，也曾同样以揶揄的口气回忆这种启蒙教育。“仿佛记得很小时念的国文教科书有过‘入学’的一课，这里旁述一个学生入学，先生问学生：‘来此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③

能成为著名教育家的杨东莼（人杞）显然不会仅凭这两年私塾的片段印象，就大肆批判旧式启蒙教育强调背诵和记忆，脱离生活和思考，无视儿童天性的教育方法。在20余年后，他娴熟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便尝试着“运用经济的历史观去批判过去的中国教育”，写下了一篇稿

① 杨东莼：《我的读书过程》，《读书通讯》，1944（92）。

② 杨东莼：《青年的读书问题》，《申报每周增刊》，1937，2（19）。

③ 杨人樾：《读书论》，《青年界》，1932，2（3）。

纸40页、字数15000余字的文章《中国过去教育的批判》。这篇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唯物主义，来批判中国封建教育的洋洋大作，被刊发在《北新》杂志上。这份当时较有名气的杂志是由民国时期著名的出版机构北新书局主办的，它的创办人是杨东莼的北京大学校友李小峰、孙伏园^①。尽管身在东瀛，但这篇文章已经为他在上海文化教育界赢得了一定声誉。他曾谦逊地预见：“认为很忠实，但我不敢自信，我谨候大家的批判之批判与反响。”^②

对于旧式传统教育的评价，除了这些简单的切身感受外，最系统理性的评价，恐怕算是30年后，杨东莼写的一篇名为《书院与学校》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再像10年前那样批判中国传统的书院为“过时之物”，当然也包括蒙馆私塾，而是将它和从日本、德国或美国漂洋过海移植到中国的“现代的学校制”，进行了全面的对比评判。在抗战救亡的大背景下，他发现了传统教育模式的可取之处，认为中国书院虽在现代社会不可复活，但若以书院的两种可贵的精神——独立自由的研究与人格



《北新》杂志

教育的实施——来补救现在学校教育的缺点，可以更好地推进国难教育。不可否认，传统书院注重人格教育，锤炼人格信仰，培养为捍卫祖国而斗争的勇士，对提高学生的正义感、社会感有重大益处；同时，对于统一全国意志，用集体力量共同克敌取胜，有重要补充作用。他甚至深信无疑：“教育界果能做到这两点，则所谓国难教育的工作，至少也完成了一半。”这一观点得到了《宇宙风》的编辑周黎庵的认可和赞扬，他在这篇文章的后面，酣畅地写下了一段很长的跋语：

今之留学哥伦比亚，刻街头称教育博士，满口柴胡之流，大概不大曾知道德国式美国式教育之外，还有一个中国固有的书院制度吧！

^① 据说，北新书局的来历，大概和北京大学以及新潮社有关，说是北京大学与新潮社各取第一个字，便成了“北新”。

^② 杨东莼：《中国过去教育的批判》，《北新》，1929，3（9）。